

中产阶级对于自身政治参与有效性的评价

——比较中国与越南中产阶级的政治效能感^①

朱 妍

摘要: 本文认为,对于市场经济转型国家,新兴中产阶级政治效能感强弱与国家放权让利的程度有关:国家权力收缩,会增强其政治效能感;当国家给予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空间较小时,专业技术型中产因为远离权力架构,会在政治效能感上弱于管理型中产。

关键词: 政治效能感 中产阶级 管理型中产 专业技术型中产

一、引言

政治效能感是评估政治参与是否有效的指标之一。一般来说,如果个体的政治效能感较强,那么就说明他/她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比较有效。许多政治制度都把促进公众参政议政作为一项目标,因此,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强弱与否也是考察政治制度是否开放的重要标准(Madsen, 1978)。一般来说,政治制度越是开放,公民的政治参与就越踊跃,其政治效能感也就越强(Karp & Banducci, 2008; Finkel, 1987)。

国外对于公民政治效能感的研究起步较早,通常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如种族、性别、阶层差异所导致的政治效能感不同,其政策意涵是为了扩大低效能感群体参政议政的途径,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满意度,夯实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Rodgers, 1974; Jackman, 1970; Form & Huber, 1971)。

目前,有关转型社会民众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尚不多见(Chen & Zhong, 2002; Iyengar, 1980; Shi, 1999),大多数研究考察一般化的“政治态度”。经济社会转型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群体,而这一群体是否会像西方中产阶级那样在现代法治建立和社会秩序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依旧不甚明朗(李侃如, 2010)。因而关注转型社会,如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政治态度的研究成果很多,既有研究也就中产阶级是激进抑或保守进行着持久的论辩(胡联合、胡鞍钢, 2008; 李春玲, 2011; 李友梅, 2005; 齐杏发, 2010; 萧新煌, 1989; 张翼, 2008; 周晓虹, 2002; Cai, 2005; Chen & Lu, 2006; Li, 2006)。

目前的研究大多将转型国家的中产阶级视作一个整体,而没有关注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由于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机遇差异,而可能在政治态度上呈现异质性。这将是本文考察的重点之一。另外,本文将研究“政治效能感”,而不是整体的政治态度。政治效能感的强弱呈现的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取向(civic orientation),因此,中产阶级如何评价自身政治参与的有效程度,是衡量这一群体政治取向的一个维度。

本文试图考察,在与西方式民主参与有很大差异的转型国家,比如中国和越南,新兴中产阶级如何评估自身政治参与的有效性? 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政治效能感的分化? 越南和中国的情况有没有差异? 如果存在差异,是否与中越两国的转型路径有关?

^① 感谢东京大学的园田茂人教授准许作者使用“亚洲动态民主调查”的数据。同时,作者感谢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刘欣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建议与指点。本文初稿曾经在2010年上海社会学年会上宣读,得到上海大学张文宏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李煜副研究员等与会代表的评论,在此一并致谢,但文责自负。

二、政治参与、政治效能感与中产阶层

阿尔蒙德(G. A. Almond)和维巴(S. Verba)(2008: 328)在经典著作《公民文化》中指出,政治效能感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个人可以对政治精英和政治决策有某种影响力的信念;而这种信念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体与政府机构的直接接触体验。比如说,个人多大程度上可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可以影响政策实施。一般认为,参政议政渠道越是畅通,政治参与机会越多的群体,政治效能感越强,也就是对自身有政治影响力的信念越强;反之,如果参与渠道很少,经常在政治上被排斥,参政议政受到阻碍,便可能引致较低的政治效能感,也就是认为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是很弱的(Rodgers, 1974; Form & Huber, 1971)。

除了直接的政治性参与之外,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与各种权力打交道的经历也会影响个体的政治效能感。非政治的决策参与或者类政治的参与体验,也就是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权威架构内的位置,是政治态度的“非政治性来源”。研究发现,那些在学校、工作单位、所在社区等传统政治场域之外的地点,居于管理决策位置的群体,或是有更多机会参与管理决策的人群,会有更强的政治效能感(阿尔蒙德、维巴, 2008; Rodgers, 1974)。

对于中产阶层与政治效能感的研究,西方情境下的经典理论认为,中产阶层是民主政体形成与稳固的关键行动者(Lipset, 1959),较之劳工阶层会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因此会有较强的政治效能感。一方面,中产阶层在西方社会的兴起最初是由于财富大量积聚所导致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新变化,为了实现对财富的管理、对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适应而涌现出大量岗位,占据这些岗位的人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米尔斯, 1985)。伴随着这一进程的是理性化的市场规则逐渐主导,而中产阶层通过非人际关系化的市场交易^①获得了经济收益和政治社会地位,他们得益于主动争取权利、参与政治,因此他们共享并传承了这种政治文化,会积极参政,支持现行制度的建设与巩固,有较强的政治效能感。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处于社会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因而其利益得失与政府决策更为相关、了解政治过程的渠道更多、政治知识更多、参政能力较强,并且受到的交叉压力^②较少(李普塞特, 1997; Lijphart, 1997)。因此,中产阶层在财产、教育、职业地位等方面的优势易于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奥罗姆, 1989: 286),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这也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效能感。

对于那些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结束的国家,如东南亚诸国,研究者在中产阶层究竟持怎样的政治态度上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认为,这些国家的中产阶层产生于政府强力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对于国家权力的依附性较强,同时也是国家干预的直接受益者,因而,这一群体由于害怕失去既得利益而对所谓的政治民主化持保守谨慎的态度(吕大乐、王志铮, 2003; 李春玲, 2011)。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获益者,这部分群体的参与热情是有限的,倾向是保守的,一般不会寻求挑战体制的参与途径(李友梅, 2005; 萧新煌, 1989; 周晓虹, 2002; Cai, 2005; Chen & Lu, 2006),因此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并不强。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中产阶层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者,他们有参与抗争、保护自身权益的初始动力,也有较强的民主价值观念(胡联合、胡鞍钢, 2008; 齐杏发, 2010; 张翼, 2008; Li, 2006),因此,这一群体积极寻求政治参与的渠道,并有较强的政治效能感(Shi, 1999)。

这几种观点都先验地将中产阶层看作是一个在政治态度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整体,对于其内部由于各种分殊而导致的态度不一致和差异并没有过多分析。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产阶层内部在政治态度上是有明显分化的,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管理者群体与专业技术人员群体之间。之所以会出现政治态度的分化是由于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握有不同类型的资本(或资产),管理者掌握的是组织资产(organizational asset),而专业技术人员拥有的是文

① “非人际关系化”,即 impersonal 一词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概念,指在非熟人社会中的各种联系,与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互动方式形成对照。

② “交叉压力”是政治行为学者们提出的概念,指行动者主体同时受到两个或以上不同方向的党派意见影响。

化资产(cultural asset)。组织资产对于管理者来说是外在的,只是与特定的职位绑定,一旦失去这一职位,管理者便会失去对这种资本的占有,从而变得不名一文。文化资产则相反,它内在于专业技术人员,并不从属于某一具体的机构或岗位,会随着专业技术人员的迁移而发生流动(Savage et al., 1992)。组织资产与文化资产的这种不同的特性,使得握有组织资产的管理者阶层会受到约束,即对政治参与更为谨慎,惟恐丢了职位;而握有文化资本的知识精英受到的约束更少,因此他们对于利益受损的容忍度更低,更倾向于积极地进行利益诉求,政治态度也更为激进。

这一观点反对将中产阶层看作是一个政治态度同质性很高的整体,而侧重对中产阶层进行细分,考察中产阶层中不同群体的态度差异,以及对差异产生的机制进行解释。这一观点区分了中产阶层所拥有资产的不同类型,并提出由于不同类型的资产与资产持有者的关系不同(有些是内生的,有些是外在的),因而造成了中产阶层内部在政治态度上的分化。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洞见,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分化与其所处的权力架构有关(Savage et al., 1992: 194 - 195)。

但是,这些观点仅仅看到了权力架构对不同中产群体的约束作用,而没有看到对其的赋权作用。他们认为,有管理职位的中产阶层会更多地受到制约,因而参与热情低下,从而政治效能感低;而没有管理职位的技术型中产,受到权力架构的制约较小,因而会更积极地进行利益诉求,从而政治效能感强。然而,他们没有看到,权力架构赋予了管理型中产群体更多参与决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而这恰恰是中产阶层政治效能感的“非政治性来源”。

三、中国与越南的转型道路与中产阶层的兴起

近三十年来,中国和越南都经历了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改革路径。这一改革进程在中越两国始终由共产党领导,改革前后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得以延续,政治架构没有发生逆转,经济上也未出现激进的大规模私有化,绝大部分的资产和资源仍然由国家掌握,这显然有异于大多数的转型经济体。在改革伊始,两国都是农业大国,经济积贫积弱,而改革使得两国都成为了令人瞩目的经济热点(Chan et al., 1999; McCormick, 1998; Walder, 2003: 901; Walder and Nguyen, 2008: 253 - 254)。这些共同的特征使得对中越两国作比较研究有了支点。

中国的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中央大一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分权让利的转变极大地调动了直接生产者的积极性(吴敬琏, 2003)。原先与政权合二为一的生产资料产权逐渐从政府的高度垄断中剥离出来,原先残缺的人力资本产权也开始脱离行政性权力的控制而可以从劳动市场上获得相应的回报(刘欣, 2010)。然而,这种还权于民的思路和作法并没有贯穿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历程。1995年前后其实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高层领导在国家层面从政治架构上进行方向性的调整。如果说,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是追求放权和国退民进的话,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重新开始走上“管制性政权”的路径(Naughton, 2009)。党和政府开始吸纳经济、社会领域原本已有的权限,政权的作用被重新定位(Wong, 2000)。中国的改革路径从目前来看,是经历了从权力高度垄断的计划经济时代到分权让利,然后党和政府再度集中权力的过程。

越南在经济起跑阶段与中国比较类似,都是国家积贫积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不得不进行改革(Boudarel and Nguyen Van Ky, 2002),国家的强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市场的功能替代物而出现的(李文, 2003)。而越南在1986年提出革新政策时,并不仅仅是引入市场机制来进行资源配置,还包括了一揽子对于社会主义路线的重新评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越共“六大”提出,越南共产党不再是单一的领导力量,而是几股力量之一(芬斯顿, 2007)。越南国家政权的领导架构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于政府和国会(相当于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赋权,而党的力量从各个方面都有所收敛。党中央仍然设有一些委员会,但是所有这些委员会都只对理论问题和发展的原则进行研究(芬斯顿, 2007: 359 - 365),也就是提出总路线,具体各个方面的政策计划都由政府和国会来负责,党的组织无法干预(窈田光纯, 1997: 98 - 100)。纵览越南这二十多年的改革可以发现,越南的

路径一直是在远离传统的、带有严重的“管制性政权”特征的政治体制，而试图建成放权的、有效运作的、民治民享的新型体制(李文,2007;叶富春,2008:140-141;Alpert,2005)。

对内改革创造的民族资本和对外开放引入的国际资本在中国和越南都发生了迅速的积累,加上本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为中产阶层的兴起创造了类似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二百年前的经济与社会条件。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与越南都兴起了一个介于权贵和劳工之间的“中产阶层”,这一群体的政治态度脱离不开国家作用的深刻影响。

之前曾经论证,国家提供的政治参与渠道和机会越多,民众对于自身有政治影响力的信念就越强,从而政治效能感就越强;反之,国家对于政治参与渠道和机会的限制越多,那么民众对于自身能够影响政治的信念就越弱,从而政治效能感也越弱。那么,根据之前对中越两国转型社会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假设1:

假设 1a: 总体上看,越南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强于中国的中产阶层;

假设 1b: 越南的中产阶层与中国的中产阶层,政治效能感并无差异。

四、中产阶层是分化的吗?

在上一节,我们已经论证,当政府放权让利时,中产阶层会获得更多政治参与的机会,他们的政治效能感也会得到提升。而在政府权力再度扩张,国家重新扮演起“管制者”的角色时,这种权力扩张对于中产阶层内部不同亚群体的影响是否会有不同,从而对其社会政治态度的分化产生效应呢?本文认为确实存在不同的影响效应,差异主要体现在管理型中产和专业技术型中产之间。影响机制是两个方面的:其一,中产阶层在日常工作中有多少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参与机会?参与机会越多,则政治效能感越强;参与机会越少,则政治效能感越低(阿尔蒙德、维巴,2008);其二,中产阶层对政治参与的诉求有多强烈?较为强烈的诉求,如果没有相应的参与机会,那么会出现心理上的不满足感,降低政治效能感;如果实际的参与机会大于诉求,或至少与诉求相匹配,那么对于政治参与有效性的评估会比较积极,政治效能感比较强(Rodgers,1974)。

下面,我们将对这两个方面一一进行论证。首先看第一个方面,即中产阶层群体在工作处境中处于何种管理层级。管理精英在日常工作中通常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无论是对人事、财务或是项目。行使管理权限时,管理精英能够体会到对他人的有效影响,甚至支配。这种影响和支配感会让管理者认为自己在参与一种类政治的决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在管理层级中获得的权威感和他人对此的尊重会给管理精英带来效能感,虽然这种效能感并不是政治效能感,然而个体并不一定能够清晰地区别开来。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认为管理型中产在其日常工作处境中往往有机会来实践一种“类政治性的参与”,这种参与形式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效能感的“非政治性来源”(阿尔蒙德、维巴,2008:328-33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管理者通常离权力中心的距离更近,尤其是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行政性管理人员。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一种“政治性的参与”,而且他们更容易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影响政策制定和实施,并形成社会影响。像中国和越南这样的政治制度总体保持不变的转型国家,仍然存在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员群体。在缺乏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环境下,这一群体就是国家的“政治人群”(political man),他们有最多的机会参政议政,产生政治和社会影响。这种工作处境很容易使得他们产生较强的政治效能感。

现在,让我们转向第二个方面。从传统体制向现代科学理性化管理的转变会使社会日益依赖各种各样的技术,循着这一逻辑,拥有技术(即文化资本)的中产群体对于权力会有更强的溢价能力,自然也就对自己获得政治上权力有更多的诉求(伊亚尔,2008;Savage et al.,1992)。但是更强的政治诉求并不必然导致更强烈的政治效能感,还需要考虑这些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满足。人们对于参政议政是否有用的评价既取决于他们本身的结构位置,也取决于他们对于所处位置的理解和认知。如果与强烈的政治诉求一并发生的是更多的有效参与机遇,期望与现实之间比较

一致,那么政治效能感会比较高;而反之,如果伴随着强烈政治诉求的是参与机会减少、参与质量低下,那么期望与现实之间有较大落差,政治效能感就会比较低。

专业技术人员的政治效能感与管理型中产相比,更容易受到国家权力角色变化的影响。当国家权力再度扩张,分权和放权出现拐点,从而侵蚀社会力量、收买市场力量之时,这对于握有文化资产的技术人员群体的政治态度影响要大于握有组织资产的管理者群体。管理者在真实的政治参与或是“类政治性参与”中有更多机会,同时也能施加较多的影响力;而专业技术群体距离政治参与机会较远,体会着现代化进程对其知识的需求与政治领域的持续弱势之间的张力。

许多关注中国近当代历史、政治、社会变迁的学者都发现,在中国,专业技术人士的生存状态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非常敏感。在改革之前,党和政府对这一群体有较深的疑虑,因此他们受到极大的打击和侮辱,社会地位低下,在政治参与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李佩如,2010:306-307)。随后,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劳动者之后,人们对于知识群体的不信任丧失了阶级依据(汤森、沃马克,2010:224)。国家充分认可了掌握知识资本的群体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科研,鼓励国际交流与合作。而正如汤森和沃马克(2010:232)所注意到的,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在30年的改革中,呈现权力集中与分散两种倾向的交替发展。比如,对于知识群体的管理,就在大力放权了一段时期之后,开始实施对于教育机构的控制、吸纳知识分子入党等举措。而转型路径中的这些特征会对知识群体的政治参与机会,以及政治效能感产生影响(燕继荣,2009)。

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效能感上是会出现分化的,专业技术群体在政治效能感上要低于管理精英群体。在越南,国家权力持续收缩,中产阶级普遍获得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则不明显。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在中国,由于“管制性政权”在改革中期的扩张,中产阶级中的专业技术型中产群体的政治效能感要弱于管理型中产群体,而在越南,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五、数据、研究设计及主要发现

本文实证分析的基础是2003年和2006年在中国和越南抽取的近4600个居民样本的个人基本信息与政治态度。此调查数据来自“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Barometer)^①。该项目由日本东京大学东亚研究与信息中心主持,在调查国与当地的社会科学院系统或商业性调查机构进行合作。2003年与2006年在中国的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中心负责组织执行;在越南的调查则由TNS商业调查公司(Taylor Nelson Sofres Vietnam)组织执行。

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在中国,2003年的调查抽取了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南京、大连、青岛8个城市的800名年龄在20-59岁的受访者,这8个城市基本涵盖了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2006年的调查将中国依照人口分成了5类地区,并同时考虑到东中西部,根据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抽取了100个市县,共调查了2000名年龄在20-69岁的受访者。在越南,2003年的调查在越南的北部、中部、南部和湄公河流域各抽取了该区域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在这些城市中随机抽取了共807名年龄在20-59岁的受访者;2006年的调查则依照PPS抽样法抽取了8个大区,在其中随机调查1000名20-69岁的受访者^②。

本研究选取2003年与2006年的数据是因为这两轮调查提供了分析所需的变量,而其它年份的

①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迄今共进行了6轮,分别是03、04、05、06、07和08年。调查在各国采用随机抽样调查,问卷内容涉及家庭生活、消费偏好、政治态度、生活满意度等多方面,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亚洲国家比较研究数据库。有关该调查的详细情况,请参见:<https://www.asiabarometer.org/en/index>。

② 如需了解更为详细的抽样执行及样本分布状况,请参见《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网》(<https://www.asiabarometer.org/en/surveys>)。

数据都在政治态度的问题上有一定程度的缺失。在 2003 年,中国和越南的调查样本数分别是 800 和 807;在 2006 年,中国和越南的调查样本数分别是 2000 和 1000。由于分析的群体是中产阶层内部的亚群体,如果用任一年份的调查所获样本,则会遇到样本量过少的情况,因而作者将这两年的数据进行了合并,共获得越南样本 1807 个,中国样本 2800 个。

分析采用多变量线性回归。政治效能感是研究的因变量,由五级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构成,量表询问了被访者对于以下三项说法的赞同程度,选项有“很赞成”(1分)、“赞成”(2分)、“不赞成也不反对”(3分)、“反对”(4分)、“很反对”(5分)和“不清楚”(9分)。

Q192: 一般说来,像我这样的人无法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为;

Q193: 政治和政府活动十分复杂,有时我无法明白;

Q194: 投票选举的人很多,我是否投票无关紧要;

在将“不清楚”处理为缺失后,我们首先对三项论述之间的两两相关性进行检验,发现各项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正值,且都在 .30 与 .50 之间^①,表明这三项论述之间的相关性较强,且测量的方向一致。因此,我们对三项论述的得分进行直接加总,得到政治效能感的分值,即一个处于 3 - 15 之间的分值,分数越高,说明对于这些说法的不赞同程度越强烈,政治效能感也就越强。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有两个,国家与中产阶层内部亚群体。其中,国家为二分变量,由“中国”和“越南”构成;中产阶层内部亚群体也是二分变量,由“管理型中产”和“专业技术型中产”构成。

对于“管理型中产”和“专业技术型中产”的划分显得有些武断,但毕竟,如何划分阶级并不是本文的重点,事实上,数据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允许我们按照学理上最为严格的方式来对阶级群体的划分。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自选题“职业类别”来清晰地识别“管理型群体”和“专业技术型群体”。管理者群体包括“企业老总或管理者(员工数大于 30 人)”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员工数 300 人及以上企业的部门主管及以上,员工数 300 人以下的企业管理者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指“受聘的专业人员(医院医生、受聘律师、工程师等)”。自雇专业人员无论是根据新马克思主义抑或是新韦伯主义的阶层分析框架,都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属于米尔斯所指的“老式中产阶层”(米尔斯, 1985),即小业主与自雇者,并不属于被雇用的新兴中产阶层,即“食薪者”(Salarariat)(Wright, 1997: 23 - 25; Goldthorpe, 2007: 104),因而不包含在内。

将企业老总与经理放在一类中确实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鉴于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进行调查的经验,抽取到大资产者的概率很低,这一笼统的划分会有逻辑上的不一致,而不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资产所有者在综合社会调查的样本框中所占比例也是很低的(Erikson & Goldthorpe, 1992)。

真正的问题则是“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并没有给出政府公务人员,即官僚群体的职业类别选项,我们根据所给的选项可以推测与“政府公务人员”最为接近的选项是企业组织的管理人员、文员或一般职员。这样一来,“政府公务人员”与“管理型中产”会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而这对于我们的研究问题并不会产生大影响。

控制变量是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年龄是连续变量;性别是二分类别变量,有“男性”和“女性”两个取值;教育程度也是类别变量,有“低教育程度”、“中等教育程度”和“高等教育程度”三个取值。

由于各变量有一定程度的缺失,在去掉有缺失值的个案之后,最终有效分析个案数为 492 个,其中中国样本 335 个,越南样本 157 个。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如下表所示:

^① 三项论述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别为:q192 和 q193 之间为 .47, q192 和 q194 之间为 .36, q193 和 q194 之间为 .36。

表 1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中国与越南

变量	中国	越南	显著性检验
男性(是=1)	.60	.52	$\chi^2 = 2.6418$
年龄	36.52	35.57	$t = 1.0578$
教育程度			$\chi^2 = 2.59$
低教育程度	.06	.02	
中等教育程度	.15	.19	
高等教育程度	.79	.79	
中产阶层群体			$\chi^2 = 29.34^{***}$
管理型中产阶层(是=1)	.32	.10	
专业技术型中产阶层(是=1)	.68	.90	
政治效能感	7.87	9.85	$t = -8.88^{***}$
N	335	157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单尾检验)。

首先,我们要看中国和越南的中产阶层在总体上是否呈现政治效能感的差异。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OLS 回归模型(参数(S.E.)):政治效能感的国家间差异

变量	模型 1(y_1)	
	系数	标准误
年龄	.011	(.012)
性别 a	-.095	(.212)
教育程度 b		
中等教育程度	-.555	(.553)
高等教育程度	-.478	(.512)
国家		
越南 c	2.019***	(.225)
-cons	7.974***	(.726)
N	492	
F	16.23	
df	486	
Adj R ²	.134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单尾检验);

a. 以男性为参照群体, b. 以低教育程度为参照群体, c. 以中国为参照群体。

表 2 显示,当控制了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之后,越南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显著地高于中国的中产阶层。按照模型所给出的系数,越南中产阶层在政治效能感上的分值是中国中产阶层的 2.019 倍。

接着我们要考察两国中产阶层内部是否存在分化。因此,我们交互国家变量与职业群体变量,形成了一个四分类的新变量,即中国的管理型中产、中国的专业技术型中产、越南的管理型中产和越南的专业技术型中产。我们试图分别看中国和越南两国的这两类中产是否存在内部差异,因而我们改变参照群体,使用同一方程进行多变量线性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中越两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确实有不同的模式。在中国,专业技术型中产群体的政治效能感显著地弱于管理型中产;而在越南,则没有出现这样的分化,两类中产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越南的中产阶层,无论哪一类群体,其政治效能感都强于中国的中产阶层,呼应了表 2 所得的结果。

表 3 OLS 回归模型(参数(S.E.)):两国中产阶层的内部分化

变量	模型 2(y ₂)变量	模型 2(y ₂)	
国家 中产群体		国家 中产群体	
中国管理型(参照组)		中国管理型	-1.646** (.636)
中国专业技术型	-.588* (.275)	中国专业技术型	-2.234*** (.618)
越南管理型	1.646** (.636)	越南管理型	
越南专业技术型	1.613*** (.300)	越南专业技术型(参照组)	-.033(.630)
年龄	.009 (.012)	年龄	.009 (.012)
性别 a	-.044 (.214)	性别	-.044 (.214)
教育程度 b		教育程度	
中等教育程度	-.617 (.552)	中等教育程度	-.617 (.552)
高等教育程度	-.464 (.511)	高等教育程度	-.464 (.511)
-cons	8.423*** (.754)	-cons	10.070*** (.936)
N	492	N	492
F	12.31	F	12.31
df	484	df	484
Adj R ²	.14	Adj R ²	.14

注: * p<0.05, ** p<0.01, *** p<0.001(单侧检验);

a. 以男性为参照组,b. 以低教育程度为参照组。

六、分析与讨论

根据上述呈现的主要发现,我们可以看到,越南的中产阶层整体上的政治效能感强于中国,越南的中产群体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是有效的、是能够施加影响力的,他们可以了解并理解本国政府的运作和政策实施,他们也相信自己在选举中投出的一票是有作用的。与此相对照,中国的中产阶层对于自己能够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信心则要弱得多。假设 1a 得到支持。

如果再看中产阶层内部的社会政治态度分化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当以中国的管理型中产群体为参照组时,中国的专业技术型中产的政治效能感显著地弱于管理型中产群体,假设 2 得到支持;越南中产阶层的两个亚群体的政治效能感都显著地强于中国的管理型中产群体,从而也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1a,即越南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强于中国的中产阶层。

当以越南的专业技术型中产为参照组时,结果显示,越南的管理型中产群体与参照组并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发现越南的中产阶层呈现与中国类似的内部分化,支持了假设 2。

本文认为,在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效能感是存在内部差异的,而这些差异恰恰是由于中产阶层内部不同亚群体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同,因而所获政治参与的机会不同,这使得不同群体对于自身在政治决策与实施中的影响力的评估会有很大差异。如果将中产阶层看作一个同质性较强的整体,可能恰恰模糊了其内部差异,而对这些差异的着重探讨能够深入对转型国家新兴中产阶层的了解,能够对他们的态度、取向等特征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既有理论基于社会结构长期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提出中产阶层内部分化的机制是由于国家的角色不同,这对于我们分析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是有启示意义的。然而,国家角色发生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条件下,如何厘清国家角色的变化而导致的中产阶层政治态度的变化?本文尝试性地给出了猜想和论证,但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参考文献:

- 安东尼·奥罗姆,1989,《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张华青、孙嘉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白石昌也,2006,《越南政治·经济制度研究》,毕世鸿译,云南大学出版社。
- 赖特·米尔斯,1985,《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 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2008,《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吕鹏、吕佳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2008,《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
- 胡联合、胡鞍钢,2008,《中产阶级:“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他——西方关于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第2期。
- 古小松主编,2007,《2007年越南国情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春玲,2010,《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中国社会学年会论文。
- 李侃如,2010,《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友梅,2005,《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李文,2003,《东亚社会变革》,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07,《东亚:政党政治与政治参与》,世界知识出版社。
- 廖建夏,2007,《越南的经济发展》,载覃元元等著《战后东南亚经济史(1945~2005年)》,民族出版社。
- 刘欣,2010,《中国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与阶层结构转型》,中国社会学年会论文。
- 齐杏发,2010,《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动向研究——回顾与前瞻》,《理论与改革》第4期。
- 窈田光纯,1997,《跃动的国家:越南》,林雅倩译,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 吴敬琏,2003,《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
-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1997,《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萧新煌,1989,《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湾远流图书公司。
- 燕继荣,2009,《从“行政主导”到“有限政府”——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 叶富春等,2008,《东亚政府与政治比较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约翰·芬斯顿,2007,《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张锡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约翰·斯梅尔,2006,《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陈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詹姆斯·R·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2010,《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张翼,2008,《当前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周晓虹,2002,《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 Alpert, W. T. 2005, *The Vietnamese econom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to an open market system*. New York: M. E. Sharpe.
- Boudarel, G. & Nguyen Van Ky 2002, *Hanoi——City of the rising Drag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Cai, Yongshun 2005,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Vol.45(5).
- Chan, A., Kerkvliet, B. J. T., & Unger, J. 1999, *Transforming Asian socialism: China and Vietnam compared*. Sydney: Allen & Unwin.
- Chen, Jie & Lu, Chunlong 2006, “Does China’s middle class think and act democratically?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s towards urban self-government”,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11(2).
- Chen, Jie & Zhong, Yang 2002, “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4(1).
- Dahl, R. 1971, *Poli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Yale,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rikson, R., & Goldthorpe, J. 1992, *The Constant Flux: A Study of Class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inkel, S. E. 1987, “The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o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support: Evidence from a West German panel”,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49(2).
- Form, W. H. & Huber, J. 1971, “Income, race, and the ideology of political effica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33(3).
- Goldthorpe, J. 1995, “The service class revisited”, T. Butler & M. Savage (Eds.). *Social change and the middle classes*. Lon-

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 Goldthorpe, J. 2007, *On Sociology—Volume Two? Illustration and Retrospec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Iyengar, S. 1980, “Trust, efficacy and political reality: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Indian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3(1).
- Jackman, R. W. 1970, “A note on intelligence, social class, and political efficacy in childre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32(4).
- Karp, J. A. & Banducci, S. A. 2008,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articipation in twenty – seven democracies: how electoral systems shape political behavio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8.
- Li, He. 2006,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and its implications”, *Asian Affairs*. Vol.33(2).
- Lijphart, A. 1997, “Unequal participation: democracy’s unresolved dilemm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1).
- Lipset, S. M.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 Madsen, D. 1978,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the Explanation of Political Efficacy Levels Under Democratic Regim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4).
- McCormick, B. L. 1998,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and Vietnam: coping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The China Journal*. No. 40, Special issue.
- Naughton, B. 2009, “Market economy, hierarchy and single – party rule”, J. Kornai & Yingyi Qian (Eds.). *Market and Socialism—In the light of the experiences of China and Vietnam*.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Rodgers, H. R. Jr. 1974, “Toward explanation of the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cynicism of black adolescents: an exploratory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8(2).
- Savage, M., Barlow, J., Dickens, P. & Fielding, T. 1992, *Property, bureaucracy & culture—Middle – class 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hi, Tianjian 1999, “Voting and non – 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 – choice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4).
- Walder, A. G. 2003, “Elite opportun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8(6).
- Walder, A. G. & Nguyen, G. H. 2008, “Ownership, organ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Market transition in rural Vietna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3(2).
- Wong, C.P.W. 2000, “Central – local relations revisited: the 1994 tax sharing reform and public expenditure management in China”. World Bank papers, (<http://www.cuhk.edu.hk/gpa/wang-files/C%20Wong%202000.pdf>).
- Wright, E. O. 1997, *Class counts—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吕 鹏